

政治的权杖与文学的匍匐

——知青运动中“株洲现象”的文学映像

周建江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 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 始终处于政治的高压之下, 在意识形态的允许之下艰难地生存。中国知青文学的表现可以作为案例来说明。文革后期, 中国知青运动因为“株洲现象”的出现有了新的景观, 知青文学也因此有了新的面目。《迎风展翅》报告文学集因其作为政治的推手而获得关注, 但也因此失去文学性的存在。它扭曲转了中国知青文学的表现, 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工具, 却因另类表现而在知青主流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 《迎风展翅》; 株洲现象; 知青文学; 文学政治化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3-0107-06

The Scepter of Politics and the Crawl of Literature

——Literature Image of “Zhuzhou Phenomenon” during the Intellectual Youth Movement

ZHOU Jianjia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College, Guangzhou, 510665, China)

Abstract: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remained in a great pressure of politics, with fighting for its survival under the permission of ideology under great hardship. We can expla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youth literature as a case study.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youth movement generated new views because of the “Zhuzhou Phenomenon”. Hence, the intellectual youth had a new look. “Wind Beneath My Wings” was gained attention by reporting literature group as a political handler, but also lost its literariness. It distorted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youth literature, and acted as the mouthpiece and tools of politics. However, it held its place among the mainstream of intellectual youth literature by its alternative.

Key words: Wind Beneath My Wings; Zhuzhou Phenomenon; intellectual youth literature; literature politicized

得益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列宁、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以及阶级斗争学说的教导, 在当代中国前三十余年的时间里, 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对强权政治统治的年代里, 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

被打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 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是统帅, 是灵魂,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教导,^[1] 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体现在思想文化战线上, 尤其如此。三十年间, 无论是批《武训传》,

收稿日期: 2013-01-15

作者简介: 周建江(1957-), 男, 北京市人,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还是评《红楼梦》;无论是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还是评《海瑞罢官》;无论是对右倾文艺的批判,还是文化大革命,无一不是从最初的文化思想方面的斗争上升为最终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高度上,完全改变了思想文化斗争的性质。与此同时,思想文化也自觉地依附于政治,用政治武装自己,^[2]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批判的旗帜下,文化思想艺术界受到最严厉的冲击。在文学方面,大批作品沦为毒草而被查封与查禁;^[3]文艺方面,大量电影与戏剧惨遭荼毒。^[4]一时之间,中国文化艺术思想界一片肃杀,充满了昏暗的血雨腥风。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中国文学完全匍匐于政治权威脚下,摇首摆尾般乞求生存,中国知识分子最大劣根性得到最充分的夸张表现,文学自觉地担当起政治流氓手中的棍子,在政治刽子手的指挥下,随意挥舞,扮演着打手和鼓吹手的角色;^[5]文学家鲜顾廉耻,叭儿狗般地唱着颂歌,声嘶力竭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涂脂抹粉,制造文学的“繁荣”局面。郭沫若有《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抒情诗,王瑶写下了《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评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国防文学”的反动性》大批判文章,一大批有声望的中青年学者加入了各式各样的“写作组”(例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浩然、李瑛、李学鳌、杨荣国等众多人,以及新生代作者闪亮登场,^[6]不断推出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崭新成果。文革后期,面对日益颓废的发展趋向,文学艺术更是不遗余力地引弓张网,制造出大批“反映时代政治”的产品,例如《鼓角相闻》《决裂》《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之流,文学闹剧在不停地上演,充斥着文化舞台的各个角落。

为政治服务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是革命文学的要求。当代中国的历次政治斗争,无时无刻不闪现着文学的身影,制造出大批性质相同、内容相似的产品,以“满足”革命人民的精神需求;人民群众也从文学艺术的表现空间里努力嗅出政治的气味和风向,把握政

治跳动的脉搏。在这样的文化空气中,认知文革时期的知青运动后期的“株洲现象”和表现这种现象的报告文学集《迎风展翅》便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1974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内刊刊发了《湖南日报》采写的报道《株洲市厂社挂钩举办社队茶、林场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得到政治强权人物的高度重视,指示派人深入调查。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个很好的典型》的调查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湖南株洲市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每个工厂在郊县都有支农点。随着工业的发展,工厂办的学校也发展起来,占全市学校50%以上。1971年,有的工厂把厂办学校的毕业生集体安置在支农点上。株洲市委根据株洲县和市郊区是丘陵地区,“七山一水二分田”,200多万亩山地多半没有开垦的自然条件和治山造林的需要出发,按照工厂的大小、毕业学生的多少,对各工厂、机关和农村社队挂钩,作出了全面的规划。安置知青的社队,就是挂钩工厂的支农点。知识青年下乡前,工厂派人到安置地点,向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汇报知青及其家庭情况,一起研究选点、编组、建房等问题。全市300多个工厂、机关等单位职工的中学毕业生,战斗在县、郊区276个社队农场、林场、茶场。经过厂社挂钩,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农业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使得这项工作变成了群众自己的事情。很多问题,厂社一商量就解决了……^[7]

《人民日报》配发的短评《大有希望的事业》指出:

厂社挂钩,发动各行各业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调动了城乡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统一规划,全面安排,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农业学大寨,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为了开发山区,举办社队农、林、茶场,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采取户口到队,劳动在场,在基本核算单位参加分配的办法,保证知识青年不脱离贫下中农。这些原则,各地都可以学习。株洲的做法,更适合于中等城市和小城镇,大城市要因地制宜。^[7]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其伊始(1955

年),就不是简单的生产力分配、发展经济这样的经济问题,而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将大批的知识青年派遣到边疆、农村、山区,是对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任务,是党所强调的知识分子工农化政策的一贯,美其名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们不否认在中国知青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像董家耕、邢燕子、白启娴这样的典型人物和像金训华这样的英雄人物,但这不过是时代需求的必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济建设当然是重要的,尤其是在边疆地区,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这样的组织里;但是在农村地区,则是加重了当地农业生产的负担,尤其是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贫困农村地区,更是加重了对于农业自然资源的破坏,出现了知识青年与当地农民之间的经济对立这样的政治问题。但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强化对于知识青年的思想改造。1965年,表现新疆垦区知识青年生活的纪录片《军垦战歌》里的5首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要把沙漠变良田》《中华儿女志在四方》《身在天山心怀天下》《红旗永远扛在肩》,清楚地说明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性质,它是多么严肃的政治运动和革命的主题。

时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经由伟大领袖的号召,更加鲜明地赋予了它的政治使命。这个时期的知识青年运动的先锋是充满革命斗争精神、曾经在“红卫兵运动”中风光至极的革命青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扎根农村,志在四方”,“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诸如此类的政治标语和政治口号将本已政治化的中国知识青年运动涂抹上更加革命化的色彩,创作出诸如《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党的光辉照征途》《革命青年奔向远方》《革命知识青年之歌》《井冈新松长成材》《向广阔天地进军》《橡胶林里歌声响》《知识青年下乡来》这样的革命歌曲,鼓舞着知识青年的革命冲动,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间茁壮成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如此一来,从1968年至1973年间,1100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文革

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主流。

然而,从1974年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呈现出强弩之末的疲软态势。曾经的“广阔天地”再也容纳下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军,农村地方经济再也承受不了安置知识青年的财政压力。但这还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现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与前几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相比,政治觉悟感和思想境界等诸多革命性方面根本不是在一个级别层面上;再加上前几年开始的工农兵学员和返城务工,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思想政治基础。这些问题的出现,偏转了中国知识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性质,严肃的政治主题让位于严峻的经济问题,开启了中国知青运动走向终结的大门和路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神圣性和革命性就此而黯然,迷惘、焦灼、幻灭成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同的感受和认知。传统的中国知识青年文学表现也因此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表现。表现“株洲现象”的知识青年文学作品集《迎风展翅》便是其中之一。

真难为《迎风展翅》报告文学集的编辑者们——中共湖南省株洲市委宣传部——的煞费苦心,如何在鲜明的政治主题和严峻的经济现实之间,以及在传统的中国知青文学的革命主题与本作品集表现题材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事实的情况下,找到《迎风展翅》报告文学集的政治、文学表现的平衡点。一方面,它是严肃的,正像该书“内容提要”所言:

这是一部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书,它用报告文学的体裁,对知识青年生活的一个部分——业余体育活动,专门作了生动的描写。读者从书中不仅能够了解广大青年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以及为革命坚持锻炼,体质增强的一般情况,而且透过生活的这个侧面,还可以看到,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深情的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离开城市,走向农村,在上山下乡的革命大道上迈出了多么可喜的步伐;他们立足广阔天地,心在五洲四海,经风雨,见世面,练思想,长才干,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农村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参加改天换地的斗争;他们为无产阶级事业正在作着多么有益的贡献。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青年,确确实实是社会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8]

另一方面,它是变异的。它没有像传统的知青文学那样去表现知识青年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如何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开展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在生产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宏大主题,而是选择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与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的表现内容,从而改变了中国知青文学写作的格局。

《迎风展翅》报告文学集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身体素质这个侧重点出发,表现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劳动生活和文化生活。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来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自己的身子骨结实的程度,毕竟农业生产劳动的强度不似绣花那般轻巧,那是需要真正的铁肩膀、硬骨头。我们看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身体素质较差。《工农呕心血 根实苗更壮》里的知识青年排排长朱秀梅刚来农村时,挑五六十斤一担的水还要休息两次。《茶场雏燕斗风雨》里的戴玉英,来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特别令人发愁的是那劳动。嫩肩上挑个几十斤的担子,要按社员们讲,挑的只够一口吃掉,而这姑娘竟还受不了。弓腰弯着背,象扭秧歌似的,走不上几步就气喘呼呼了。”《迎风展翅》里的罗丽华“高中毕业后,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烈愿望,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农村。”但因为体质很差,“手拿锄头,就起血泡;肩挑担子,腰酸腿痛;社员下地打赤脚,她却穿上胶鞋才能走路;收了工,别人又跳又唱,她却往床上一躺,越躺越疲劳。”《山乡开遍映山红》里“中学未毕业,就申请提前下乡的女知识青年蔡桂珍,原来是不大爱好运动的,还患过气喘病,初登棋盘山,两手空空也累得她气喘吁吁。”《欲与天公试比高》里的“共青团员张秀莲,从小体弱多病,一年要穿六个月的棉衣。刚下

农村,三尺扁担立在面前,她只高出一头。头回参加劳动,四、五十斤的担子就压得她伸不起腰,出不匀气。”

由此,切入了《迎风展翅》的创作初衷,表现通过体育锻炼的形式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锻炼,正像《欲与天公试比高》所讲的:“两年来,南岸知识青年在毛主席革命体育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炼红了思想,增强了体质,坚定了扎根农村,与天奋斗的信心。”《工农呕心血 根实苗更壮》里的朱秀梅参加了篮球运动,“没过多久,朱秀梅担水的桶子已经换成大号的了。一百多斤一担的水,一口气挑回伙房,一担接着一担地挑着,可真是‘加大马力’了。别人劝她休息一下,她笑嘻嘻地说:‘我这不是一边挑水一边休息吗?你看,右肩挑,左肩休息,左肩挑,右肩休息,劳逸结合,劲还使不完呢!’”《茶场雏燕斗风雨》里的戴玉英通过体育锻炼,“体质也增强了。刚下乡时体重不过九十斤,后来增加到一百零五斤,挑上百二三十斤担子也不在话下。”《迎风展翅》里的罗丽华“过去挑上四十斤担子还感到累,现在肩挑百三十斤,还快步如梭。在那垦荒造田的日子里,成了一名大干快上的闯将。”《山乡开遍映山红》里的蔡桂珍“坚持天天爬山、晨跑、打球,成了体育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现在她气不喘了,个儿长高了半个头,体重增加了二十斤,成了名副其实的山里人。”《欲与天公试比高》里的张秀莲“抗旱挑水,百把斤一担的大桶抢着挑,身直腰挺,登山如履平地。”体育锻炼对于知识青年太重要了。“下乡劳动锻炼两年,我们从斗争的实践中体会到,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光辉指示,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有一副铁身板不行啊!”《迎风展翅》报告文学集通过体育锻炼这个角度反映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的生活,提供了审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的截断面。

单纯表现知识青年身体素质提高不能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学创作,主题思想是崇高的。体育锻炼仅仅是革命的一种形式,不是革命的目的。正像《工农呕

心血 根实苗更壮》文章所评论的那样:“不开展社会主义体育活动,青年们的体质不行;不用社会主义体育去占领业余阵地,青年们的扎根思想就可能受到动摇。积极开展体育运动,既是增强体质的需要,更是用社会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它对帮助青年们转变感情,闯过劳动、生活关,树立扎根思想很有好处。”体育活动成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发挥主体作用,占领农村文化舞台的重要形式。《工农呕心血 根实苗更壮》文章明确指出:“体育活动的开展,为在业余阵地上不给资产阶级有半点空隙,为社会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起着积极的作用。这是一场不见流血的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资产阶级向我们夺人,我们就要对资产阶级专政。在这场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体育锻炼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里思想斗争的表现载体。《茶场雏燕斗风雨》里的戴玉英在一场乒乓球比赛中虽然赢了球,却输了精神,“比赛不单是比技艺,更重要的是比革命意志。”戴玉英反思到:“为什么球赛中表现意志脆弱?又为什么在坚持乡村的道路上产生了动摇的情绪,原来,这两种表现却是一个本质。它是一个思想在不同的问题上的不同暴露形式罢了。”同篇报告文学里的刘星华在体育锻炼活动中,“不仅取得了驾驭自然风浪的‘自由’,在社会的阶级斗争中,也能顶着风浪前进。”坚定了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一切交给党安排”。通过体育锻炼,知识青年们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意义,在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开展阶级斗争,粉碎阶级敌人制造的“回城”阴谋。《春满小村》表现知识青年来到农村、经过劳动锻炼皮肤晒黑了,手上也起了茧,阶级敌人就跳出来捣乱,用封建的旧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阵地进攻,致使部分知识青年迷失了方向。“从业余思想文化阵地上反映出来的情景,是知识青年精神面貌的一个缩影。阶级敌人想从业余开缺口,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运动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广大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树得更牢。”

“株洲现象”的出现,是对中国知青运动渐趋举

步维艰境地的变通与修正。曾经的“广阔天地”已经容纳不下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张窄窄的床铺,“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口号只有停留在天边回响,“大有作为”变成了小安即可。总之,中国知青运动中传统的思想和做法在“株洲现象”中得到了新的阐释和解说。

但是,这样做毕竟偏离了中国知青运动的传统习尚。“株洲现象”虽然维持着中国知青运动的继续开展与进行,但其间的政治精神受到消解,政治目标的实现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曾几何时的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不动摇的誓言,现在被“坚持乡村,建设乡村”的口号所取代,并且被吹嘘为这是“一片鼓舞人心的情景”。虽然政治领袖们极力赞扬“株洲现象”的做法,但他们也深知这种做法所带来的警示作用,“永久”牌变成了“飞鸽”牌,中国知青运动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历程。

然而,现实生活中变通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意识形态的认可。将中国知青运动的政治功能结构为经济行为,将知识青年的安置从经济成本上核算,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知青运动锻炼人、改造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政治初衷和目的,动摇了中国知青运动的政治基础。更何况“株洲现象”的重点在于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至于投入到农业生产的结果与效果如何则不在重点考虑之中,尤其是自行安排的知识青年与当地的社员群众并不能融合在一起,何谈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何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何谈成为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何谈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所有这些本是中国知青运动的目标,现在在“株洲现象”里却看不到。如此一来,又怎能让意识形态放心。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严重不足,由于“株洲现象”得到了政治领袖们的高度评价和大力推荐,意识形态必然要有所表示,体现在文学上,便有了《迎风展翅》报告文学集的推出。

“株洲现象”的客观存在,着实让《迎风展翅》报告文学集的编写者们为难。约定俗成的中国知

青文学传统题材和主题,已经规范了知青文学的表现内容,以阶级斗争为统帅的“三大革命”,以路线斗争为主线的政治斗争,以工农兵形象为主体的人物形象塑造,以革命事业接班人为目标的优秀知识青年成长,这些内容不是“株洲现象”所拥有的。宏大的主题叙事得不到相应的生活实例支撑,知识青年的群体生活取代了英雄人物展示的场景,尖锐的阶级斗争、严峻的路线斗争、丰富的科学实验被隔绝在知识青年的生活之外。这些客观事实的存在,限制住了文学写作的手脚,无奈之下,只能选择知识青年在农村的适应性生活,从最初的身体锻炼开始,到基本劳动的进行。如此一来,影响到文学性的发酵;而《迎风展翅》报告文学集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也恰恰说明《迎风展翅》报告文学集写作的困境,说明《迎风展翅》报告文学集文学性的缺失。

放在中国知青文学史的作品序列里,《迎风展翅》报告文学集无足轻重,它的人物形象因为是白描手法而显得呆板,事件叙事平面化,导向性的政治评论随处可见,完完全全是政治宣传的产物。从文学性上讲,《迎风展翅》报告文学集是中国知青文学走向终结的开始。不过,从中国当代文学政治化的文学表现中,《迎风展翅》报告文学集也可以作为案例,说明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倾向性,以及在极权政治的钳制下,文学是如何运作与生存的;在政治的夹缝里,文学是如何扭动自己谄媚与妩媚的身段,向政治示爱,求得政治的青睐的。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文学的表现与特性,可以从《迎风展翅》

报告文学集中见到一斑。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毛主席论政治工作[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2] 林默涵.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
- [3] 北京图书馆无产阶级革命派编辑小组. 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图书批判提要(350种)[M]. 北京:北京图书馆无产阶级革命派编辑小组自印本,1968.
- [4] 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电影批判联络站,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M]. 北京: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自印本,1968.
- [5] 广东人民出版社. 更高地举起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旗帜[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7.
- [6] 张红秋. 与“文革”有“染”——“新时期”作家(评论家)在“文革”时期的文艺活动[DB/OL]. (2007-10-01). <http://sq.k12.com.cn/discuz/archiver/tid-321112.html>.
- [7] 顾洪章.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113-114.
- [8] 中共湖南省株洲市委宣传部. 迎风展翅[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5:扉二.

责任编辑:黄声波